

国内市场需求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贺力平

要目：

- 一、 基本前提和问题提出：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市场制约
- 二、 分析框架：影响市场需求长期平稳增长的主要因素
- 三、 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分析：A：总量；B：结构；
- 四、 国内投资需求展望
- 五、 结束语和政策建议

一、 基本前提和问题提出：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市场制约

从 1978 年到 1998 年，中国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逐步对外开放。中国取得了长达 20 余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在从现在起的未来 20 年中，中国经济还能维持如过去 20 年中的高速增长吗？《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报告的其他部分从要素投入、技术发展和组织管理体制等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本文拟从市场需求这个角度来说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

让我们首先陈述一下过去 20 年中中国经济环境中已经显现出来的几个变化趋势，这些事实可以看做是我们分析对未来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市场制约的基本前提：

第一，中国经济发生了从“政府需求依赖型经济”到“市场需求依赖型经济”的转变。在改革前的 20 年中，中国曾建立起了一个高度计划化和准军事化的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以中央政府及其各个部门为核心的社会机构集中了全国经济的主要资源，它们的计划工作——即对各项资源的征集、分配和使用——形成了社会需求的主流；工厂活动和基本农业生产活动围绕政府需求而运转；城乡居民的自主性消费主要限于日用消费品。不论是在短期中还是从长远看，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在不损害资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调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

改革运动逐步改变了这种经济格局。国民收入开始向居民部门倾斜。首先，农村居民从农副产品价格调整中获得了收入增长，并从将资源转向高价格农产品生产中得到了收入增长。其次，城市居民的收入也随着工资调整、大量生产性部门向个人经营者开放而得到了快速增长。第三，随着公司化、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银行成为经营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者，企业所得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以红利和利息等形式转向个人投资者或储蓄者。

收入在部门间分布格局的这种变化促使居民部门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显著提高。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市场需求依赖型经济”的特征：居民部门成为社会需求的核心力量；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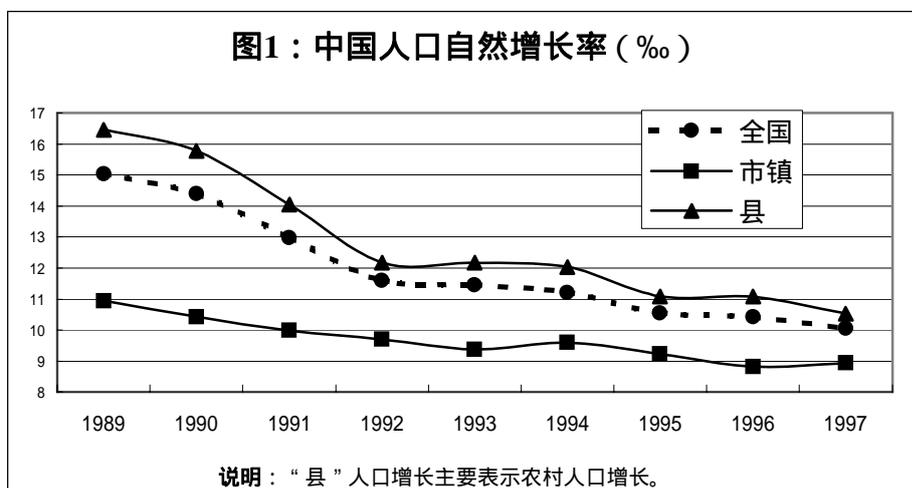
* 本文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课题的一项专题报告。该研究课题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资助。作者感谢以下人士在本报告的各个或不同研究阶段上所提供的帮助：樊纲、王小鲁、余永定、易纲、张小晶、武剑、夏小林、张平、黄小京、乔桐封、朱赛妮等。但任何错误或疏漏由作者负责。

根据市场价格、收入水平、偏好和预期等经济变量进行消费/储蓄决策；居民消费形成最终需求；企业的生产活动围绕居民需求而运转；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征集主要依靠税收和债务融资，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先通过官定价格等手段将社会净产值向工业部门集中、然后通过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上缴形式集中到政府手中”。

第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资源分布的变化，企业扩张和政府经济行为也出现了方向性改变。生产部门的投资在过去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性资金投入，在改革的过渡时期中主要依赖国有银行机构“半财政性”信贷资金投入，这两种资金投入方式都未对生产部门的资金回报率提出足够高的要求。现在和未来时期中，企业化的中国生产部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资本市场取得投资资金；随着国有银行自身的体制改革和商业化，国有银行机构也将对企业客户提出越来越高的资金回报率要求。为了满足资金提供者对资金回报率的要求，作为资金使用者的企业将被迫贯彻资金使用效率原则。而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企业只有走上面向市场的道路，积极适应市场，根据对市场的研究和预测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因此，市场需求、尤其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影响企业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已经放弃了试图建立无所不包的国有经济体系的企图。相应地，政府开始按照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即，将政府经济活动主要限制在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那些被允许保留下来、在非公共物品领域中继续活动的国有企业，也将被要求更加重视市场化经营原则。因此，全面地看，在未来 2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将以市场为导向。

在这样一个国民经济框架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便由过去的直接干预为主转为间接干预为主，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成为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在短期中，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影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但在长期中，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趋势将由那些基本经济因素所决定，例如，人口增长、消费者倾向、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行为和技术进步、国际经济差距等等。



第三，未来 20 年中，中国人口增长将继续从高速增长型向减速增长型转变。在改革前的 1950-1980 年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96%，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91%，中国超过世界。在 1980-1995 年期间，中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到 1.37%，开始低于同期内世界人口增长率 1.59%。未来 20 年中，许多预测显示，中国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按照中国研究者一项人口增长预测，在 2000-2020 年期间，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在 0.79%（高方案）至 0.46%（低方案）之间¹。按照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1995-2015 年期间，世界人口增长率为 1.2%，而中国人口增长率为 0.7%²。可以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的增长不仅将明显慢于

世界人口，而且其速度将低至发达地区自 70 年代以来的水平。

中国人口增长的减速过去主要靠了政府人口增长控制政策。未来时期中，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自发性因素将对人口增长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城市和农村中人口增长速度都趋于减缓（参见图 1）。

伴随人口增长减缓，人口结构将会出现一些显著变化。人们的平均寿命会升高，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老龄化）会上升，每年的结婚人数可能会减少，每年新出生的人数也可能逐步减少。即使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这些人口变化都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储蓄决策。

最重要的是，正如发达国家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人口减速增长会促使人们相对减少对物品供应数量上的需要，而较多地转向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随着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期望值的升高，人们对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要求和期望值也会增强或升高，为他们供应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也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生产率进步和质量改进。

第四，中国经济的内外差距在缩小的基础上继续存在。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差距。1998 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国列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组。但由于起点过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将显著存在。在中国经济内部，各个部门和地区之间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的差距现在仍然十分明显。这些国内外经济差距的存在，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中国生产者面临多层意义上不平衡的市场结构：

- 中国城乡市场之间的“二元市场结构”：不仅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而且中国农村居民尚有大量自给生产行为；
- 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分化趋势已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中都出现，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水平在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上的差别已经明显；
- 在中国的各个省区之间经济差距也相对明显，省区内部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或大或小的经济差距；
- 那些使用无优势的技术并以本地市场为对象的企业需要保护，以免免受来自外地或外国产品的竞争；
- 那些使用优势的技术并以全国或全球性市场为对象的企业需要更多的市场开放，不仅是国外市场对中国的开放，而且是整个国内市场对优势企业的开放；
- 国外企业的成本节约需求促使许多企业来到中国建立工厂，利用中国的便宜劳动力；另外，那些看到中国市场潜力 - 由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高收入阶层的出现所决定的前景 - 的国外企业也开始来到中国；这两类企业在中国的活动都帮助中高收入阶层在中国的扩大，并与其他因素一起使中国居民各阶层的收入增长呈现不规则的、跳跃性的增长波动。

上述这些情况，十分可能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市场的结构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较为急剧的变化和调整，这对那些正在努力适应新市场环境的企业来说，既是新的机会，又是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市场制约的问题似乎就可以表述为：中国生产者的长期产出会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吗？

二、 概念框架：影响市场需求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

关于产出与需求的平衡关系，经济学文献中流行着“萨伊定律”：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简单地理解这个命题，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市场需求会自动地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增长，两者之间不存在差距，经济增长不会面临来自市场需求的制约。

事实上，供求平衡应当从几个不同层次上来定义，“萨伊定律”所所谓的只是其中的一

个方面。首先，任何经济中都存在会计或统计上的供求平衡，即事后的（*ex post*）供求相等。任何交易活动总是意味着买卖数量相等，所以从结果上看，没有供求不相等的可能性。延伸到一个封闭的国民核算帐户中，这也意味着储蓄总是等于投资。但是，供求相等的会计恒等式没有说明潜在的产出是否能发现相应的市场需求。

其次，人们常说的供求平衡原则往往出于长远的观点，即从长期看，如果我们认为生产者拥有足够的市场适应性和进行调整的灵活性，那么，供求之间或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失衡仅仅可能出现在短期中，而在长期中供求会趋于平衡。尽管短期经济失衡也可能带来严重经济问题（例如大量失业）并要求社会采取相应解救措施，但在长期中，人们似乎有理由不用担心失衡问题。但是，如果认为长期供给将与长期需求相适应，这其实意味着在供求平衡条件下长期需求制约着长期供给的增长率。例如，如果设想未来 20 年中市场需求增长率为 5%，那么，尽管长期供给能力的增长率可以达到 7-8%，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只能按需求增长率来决定，而这意味着有 2-3 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能实现。

第三，“萨伊定律”则可以看做是供求平衡的强定理：需求并不独立于供给而存在，面向市场的供给是由那些具有需求愿望的生产者所创造的，他们在创造供给的同时也就创造了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完全由社会的长期潜在产出的能力及其扩大来决定。

也许正是出于对供求平衡强定理（“萨伊定律”）的默认，许多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文献通常不讨论市场制约问题。但是，一些当代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在短期和长期中，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概括地说，这种制约可以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储蓄陷阱**”。如果我们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认为储蓄和投资往往由不同社会成员来进行，它们分别决定于不同的经济变量（例如储蓄取决于人们的消费倾向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等因素，投资取决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回报率和资本价值的预期变动等因素），那么，国民经济中可能缺乏自动的机制来保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

进一步说，如果认为储蓄是当前收入减去当前消费并用来帮助增加未来收入的资产形成，那么储蓄变动就代表着社会最终消费需求和资本供给按相反方向的变动。例如，储蓄倾向的提高意味着消费需求按比例减少和资本供给按比例增加。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消费市场的缩小和资本供给的增加带给投资的综合效应是投资数量不变，那么，作为消费需求和投资加总的社会总产出在储蓄倾向升高的情况下便减少了³。换言之，储蓄倾向提高的结果并不必然带来总产出的增加，除非它能伴随投资的相应增加。

大多数经济学家根据 60 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认为，高储蓄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利因素，而储蓄率的崩溃则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滑坡⁴。理论上，高储蓄的积极性在于：首先，它提供了较大的资本供给，使投资的快速增长不再或较少受到来自资本供给的限制；其次，它有利于降低长期实际利率，从而推动投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高储蓄的这些积极性是有条件的，即它必须伴随国内投资需求的相应增长、国内储蓄不会因为诸如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一类的原因而流往国外。既然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不完全在于储蓄，因此，需求制约便应当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而加以研究。

第二，“**城市化陷阱**”。对存在显著城乡差别的发展中经济来说，市场需求的增长可能面临一定程度上的“城市化陷阱”。设想一个建立在城乡移民工人和城乡市场相对分离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在这个经济中，竞争性的城市工业大量雇佣来自农村的富余劳工，后者得到的平均工资虽然高于他们在农村就业的边际收入，但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中的永久性生活方式。这样，移民工人收入中的一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并流向农村家乡市场。理论上，以这种方式流向农村家乡市场的资金会形成对三种产品的需求：对原来使用非货币手段的当地交易活动的需求（即推动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对当地生产企业产品的需求（例如乡村企业），对面向农村市场的城市工业产品的需求。前两种需求的存在并在一定时期中的突出规模显然会限制城市工业的市场空间。城市工业产品的市场不随城市工业雇佣移民工人的就业增长而相

应增长便成为可能。

不难认为，消除“城市化陷阱”的条件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农村经济基本完成了货币化；其次，乡村工业的增长会产生出足够多的对城市资本品工业的需求，从而弥补城市消费品工业市场的相对萎缩；第三，城乡收入差别已经缩小到这样一个程度：农村移民工人到城市寻找就业的主要动机已不再是储蓄“城乡收入差”以便将之用于在家乡的消费活动。对象我们中国这样的尚有显著城乡经济差距的国家来说，实现这几个条件大概需要相当长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可以说“城市化陷阱”的不利影响一直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

另一方面，在过渡时期中，克服“城市化陷阱”的一个途径是发展城市工业的国外市场。

第三，“收入分布陷阱”。收入在不同社会成员中分布通常总是不平均的，在一定时期中这种收入分布不平均的趋势还可能加重。如果高收入成员具有不同于低收入成员的消费倾向，例如在国际经济差距的背景下，高收入成员拥有较高的消费进口物品的倾向，低收入成员拥有较高的消费国内物品的倾向，那么，随着高收入社会成员的较快增加或他们收入的较快增长，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出现国内产出增长与国内市场增长不同步的情形。

弥补伴随着收入分布不平均而出现的国内产出与国内市场之间的差距，可以有两个途径：一是发展与进口相竞争的国内产业从而缩小进口需求，另是扩大出口产业从而在不减少进口需求的背景下增加进口支付能力。哪一种途径成为主导取决于国际经济和技术差距。前一种方式较多地要求国内产业具有与国际水平相当的技术能力，后一种方式在存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则可能主要要求国内劳动成本相对国际水平较为便宜。后一种方式通常被叫做“外向型发展模式”，即利用国际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工相结合，专业化于出口产品的加工生产。这种方式是否会进一步加重国内收入分布的不平均趋势，是一个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⁵。

上述“城市化陷阱”和“收入分布陷阱”都可以看成是“国内市场陷阱”的表现，即：在一定条件下，国内市场不能随国内产出的扩大而相应扩大。如果国内产出受到国内市场增长相对缓慢的制约，那么，应当探讨国外市场对国内产出的需求潜力问题。对已经在外向化发展上取代巨大成就的中国来说，则应当进一步探讨未来时期中世界市场吸收我国产品的潜在能力。

综上所述，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市场需求并不必然随产出或产出能力的增长而相应增长，两者之间脱节的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存在的。根据流行的经济文献，表1列出了影响社会需求各个部分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社会需求的各个部分分别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它们的变化即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为了促使市场需求的增长能与产出增长保持同步趋势、帮助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有哪些因素可能制约需求增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表 1 影响社会需求的主要因素：概览

	定义和意义	主要的决定因素
居民消费	对最终物品的需求；国内市场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	收入水平及其增长；消费/储蓄倾向；对未来实际（相对）收入的预期；消费信贷的普及程度；消费观念（改变消费习惯的难易程度）。
投资	对资本物品的需求；长期供给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资金供给者与资金使用者之间的制度关系；长期实际利率；厂商的市场预期；技术进步（产出效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企业家的风险观念。
政府支出	公共物品的供应；转移性支付的主要渠道；短期内调节社会需求的一种手段。	政府与经济的制度关系；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纳税的意愿程度）；政府运作转移性支付体系的公正性和效率；政府在内外市场上债务融资能力（信誉度）；经济周期波动。
净出口	外国对本国产出的需求减去本国对外国产出的	长期内：国际经济和技术的相对差距及比较优势；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进程；短期内：汇率稳定/变动

本文主要分析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

三、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期趋势

我们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期增长趋势。影响总量消费趋势的因素主要是消费/储蓄倾向，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包括城乡经济差别和收入分布的效应等。

A、消费/储蓄倾向：影响总量趋势的决定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形成了按国际标准来看较高的储蓄倾向（储蓄率）。一项统计显示，在 1978-1994 年期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从大约 1% 上升到 21%⁶。居民的高储蓄倾向，为中国的高资本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持。未来时期中，我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还会继续发挥这样的积极作用。许多研究者也认为，未来时期中我国居民很有可能继续保持高储蓄倾向。

我们的问题是：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倾向会发生剧烈变动——在短期内大幅上升或大幅下降吗？如前所述，短期内消费储蓄倾向的剧烈变动对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图 2 对比了 1993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加额与新增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表明，在 1993-98 年期间，这个比例一直在上升，从 1993 年的 45.7% 上升到 1998 年的 149.1%。在这一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度增长率从 13.5% 下降到 7.8%。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是居民储蓄的一部分，但这个来自部分的统计数字已经可能表明我国居民储蓄倾向近年来有了快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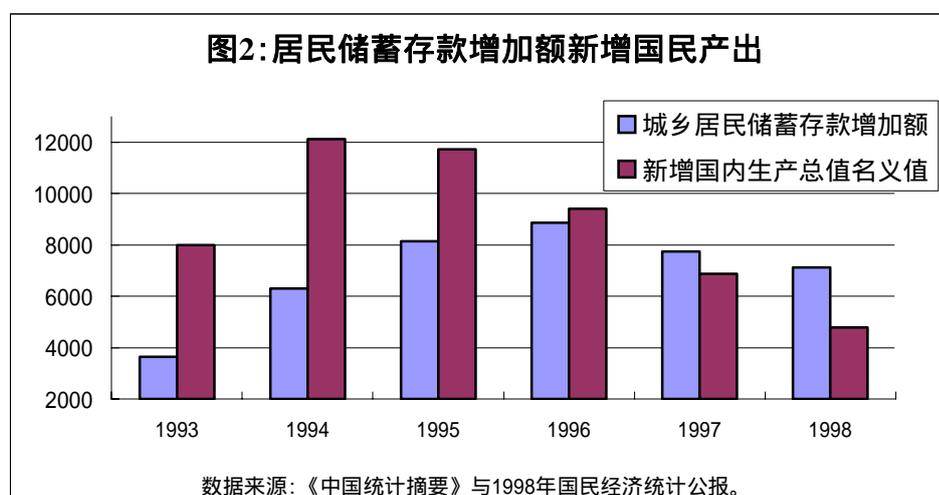


图 2 中关于我国居民储蓄的统计数字只包括银行储蓄存款，在居民已经拥有大量其他储蓄或投资手段（例如认购债券和股票、购买房屋等等）的 90 年代，这个统计可能低估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当然，另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中包含着以个人名义存放的机构资金，此部分则会高估居民的储蓄率）。

表 2 中以另一种方式估计了我国城乡居民在 90 年代的储蓄率。居民储蓄被定义为消费支出与收入之差。这里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来自城乡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材料。表 2 的估计显示，1992 年起，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率都显著上升（1992 年比 1991 年分别提高 3 个百分点），而且几乎是持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 1996-97 年间，农村居民的储蓄率陡然提高了 4 个百分点，使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在这两年间仅有些微的增加。如果

按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从 1996 年的 11% 垮掉到 1997 年的 0.4% (图 3)。换言之，如果没有人口增长因素，1997 年农村的消费市场就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显然，农村居民的消费/储蓄倾向在 1997 年发生了剧烈变动。

表 2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储蓄率 (平均每人每年，现价元和%)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收入	消费支出	储蓄率	收入	消费支出	储蓄率
1990	1510	1279	15.3	686	585	14.8
1991	1701	1454	14.5	709	620	12.5
1992	2027	1672	17.5	784	659	15.9
1993	2577	2111	18.1	922	770	16.5
1994	3496	2851	18.4	1221	1017	16.7
1995	4283	3538	17.4	1578	1310	16.9
1996	4839	3919	19.0	1926	1572	18.4
1997	5160	4186	18.9	2090	1617	22.6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7 和 1998 年。本表数据基于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城镇居民收入为“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为“纯收入”；“储蓄率”为收入减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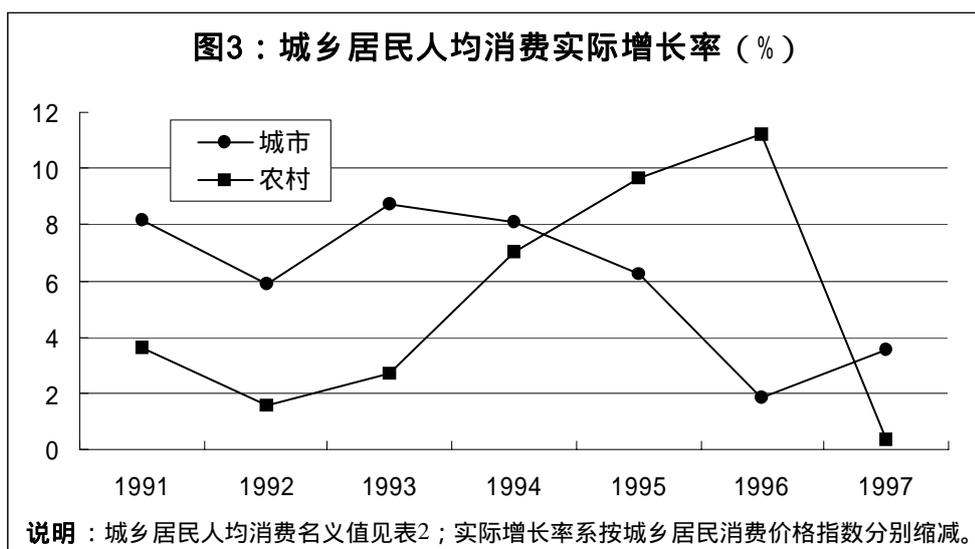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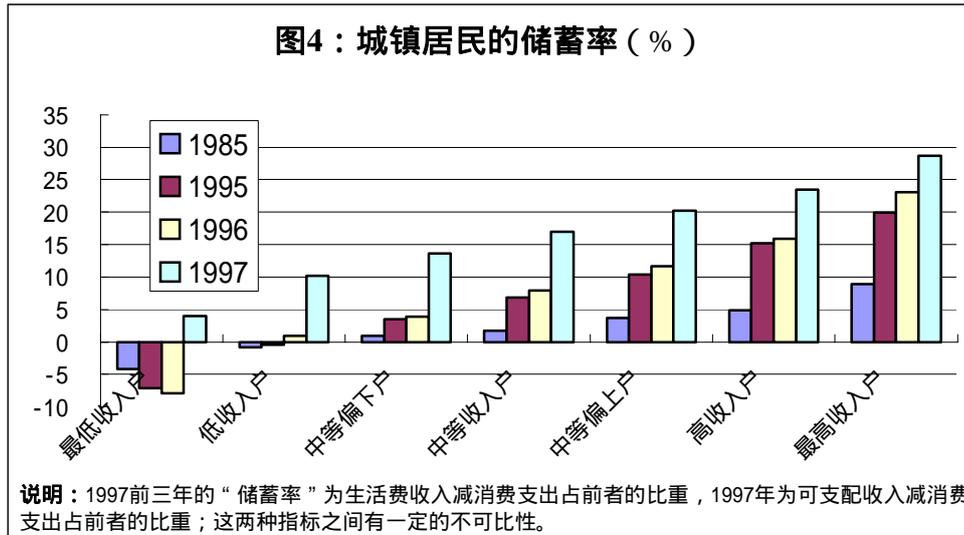


图4：城镇居民的储蓄率（%）



关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储蓄倾向，我们可借助图4的数据进行一些分析。让我们分时期来观察分收入组别的城镇居民平均储蓄率及其变动。对比1985和1995年的数据，我们看到，*低收入户*的储蓄率在这期间一直为负数，其中的*最低收入户*的负储蓄还显著增加了；同期内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出现在从*中等偏下户*到*最高收入户*的各组别中。对比1995和1996年，*最低收入户*的负储蓄继续增加了，同时，其他各组别的储蓄率皆出现上升；但上升最多的是*最高收入户*——这个组别的储蓄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对比1996和1997年，我们知道，这两年的统计数据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收入指标，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1997年所使用的“可支配收入”在统计口径上大于以前所用的“生活费收入”，所以1997年各组别的储蓄率都比1996年大幅度地“上升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即使1997年的“储蓄率上升”中包含统计口径调整的因素，但这种“上升”在各组别的不平均分布也可能说明一些问题：1997年的“储蓄率上升”较显著地出现在从*最低收入户*到*中等偏上户*的各个组别中，而在*高收入户*或*最高收入户*中的“储蓄率上升”则相对小。例如，*低收入户*的储蓄率“上升了”9.2个百分点，*高收入户*“上升了”7.6个百分点，*最高收入户*则仅“上升了”5.5个百分点。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出现，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从1996到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中中低收入户的储蓄倾向较高收入户出现了显著上升。

“我国城镇居民中的中低收入户近年来的储蓄倾向出现了显著上升趋势”虽然是一个有保留的结论，但实际情况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对我国消费市场的不利影响也应当是显著的。如果说中低收入户的消费支出是支撑对国内产品的国内需求的主要力量，那么他们消费倾向在短期内的减弱肯定就是让国内企业感到市场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如果说在过去居民储蓄倾向的上升或消费倾向的下降对消费市场增长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在未来时期中，随着人口增长的减缓，居民储蓄/消费倾向的变动对消费市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导致中低收入户显著增加储蓄的动因很可能与近年来经济环境和经济体制的变化有关。他们也许感觉到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诸如在求职、失业、下岗、职业变换、住房和医疗保健制度等方面。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在步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追求生产率改进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中国还没有完成这些转变。在未来时期中，这些转变在给我国居民带来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新机会的同时，也将会多多少少继续给我国居民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如何妥善地协调好体制改革和变换、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带给居民的不确定性及其不利的经济影响，显然是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所必需的。

B、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

按照国际统计标准，中国用了 20 年的时间从低收入（low income）水平跃升至中低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水平。很有可能，中国将再用 20 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跃升至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水平。随着平均收入水平的升高，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一定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剧烈程度和快慢也将一定会给面向中国市场的生产者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

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可以说体现了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通常具有的那些特点，同时也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特点，当然还体现了中国人民固有的一些文化传统习惯及其影响。表 3 比较了中国城市居民与世界几个代表性国家居民的消费支出构成。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居民与收入水平较低的其他国家的居民一样，花在食品和衣着上的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较高，而花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占较低比重。另一方面，一些非收入水平的因素也体现在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构成中。例如，中国城镇居民在居住（包括房租和水电费等）上的开支比重较低，大概反映了城镇居民在这些方面仍然多多少少享受着来自政府和或工作机构的间接补贴 - 而这些补贴、尤其是那些“暗中的”补贴（例如低房租和低水价、低燃气费等等）大多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行惯例。再如在交通通讯上的开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我国城镇职工在工作机构附近地区居住（居住在由工作机构提供的宿舍群落）由工作机构为职工提供集体交通工具、城镇居民喜爱使用私人成本较为低廉的自行车等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这种开支的比重在我国较低。此外，我国城镇居民中流行的“双职工”家庭类型、个人服务业的相对不发达等因素也可能促成了我国城镇居民对家庭用品的较高需求（诸如洗衣机一类的耐久用品具有替代劳动时间或服务活动的功能）和对服务活动（包含在表 3 中的“其他”项中）的较少开支。最后，我国城镇居民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看来是“文娱教育”占较高比重的原因（在这方面，我国城镇居民的水平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表 3 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国际比较 (各项支出占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

	食品	衣着	居住	交通通讯	家庭用品	医疗保健	文娱教育	其他
中国	46.6	12.4	8.6	5.6	7.6	4.3	10.7	4.4
美国	12.0	6.1	18.3	13.6	5.9	17.5	10.2	16.5
日本	20.1	6.2	20.2	9.8	6.1	11.0	10.3	16.3
韩国	29.7	4.0	12.3	13.2	6.9	6.3	12.5	15.1
印度	54.1	10.0	9.8	11.5	4.3	2.3	3.8	4.2

说明：中国数据为城镇居民，1997 年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1998 年》；国外数据为全体居民，来自《国际统计年鉴 1997 年》，其中美国和日本数字为 1992 年，韩国为 1994 年，印度为 1991 年。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构成在未来时期中将会出现显著变化。近年来的一些迹象显示，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在一些领域中已经开始出现调整。自行车曾是我国城镇居民的主要私人交通工具，自行车在我国的广泛普及使我国在世界上享有“自行车王国”的称号。正如图 5 所示，我国城镇居民自行车拥有量到 1995 年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但这一趋势到 1997 年就转为下降了。而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高收入居民显著地减少了他们的拥有量（图 5 中 97 年和 92 年曲线的差距随收入水平而越来越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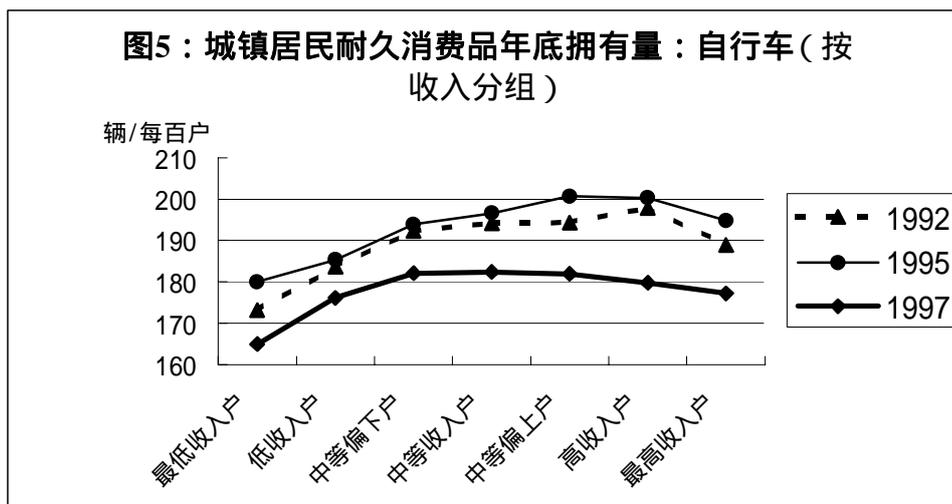


表 4 居民耐久消费品平均拥有量:中日比较 (单位/每百户年底)

	中国		日本	
	1990	1997	1980	1995
自行车	188.6	179.1	80.2	80.3
彩色电视机	59.0	100.5	98.5	99.1
洗衣机	78.4	89.1	99.2	99.2
电冰箱	42.3	73.0	99.2	98.4
电风扇	135.5	165.7		
缝纫机	70.1	57.5	83.1	76.6
照相机	19.2	33.6	85.2	84.9
空调		16.3	41.2	77.2
微波炉		5.4	37.4	88.4
个人电脑		2.6		17.3

说明：中国为城镇居民(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和1998年);日本为全体居民(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年);空白处表示统计数字不详或统计数字微不足道。

可以认为,在未来20年中,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支出构成将会出现两大方面的变化趋势:首先,中国城镇居民在食品和衣着上的开支比重将持续下降,尤其是在食品上的开支比重(恩格尔系数)。在这两项商品上的开支目前占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59%,比1982年时的73%减少了14个百分点(15年中几乎一年减少1个百分点)。在未来20年中,预计它们再减少15个左右的百分点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样,中国城镇居民在非食品和非衣着上的开支空间就会相应地大幅度增加,从现在的39%提高到55%左右。其次,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城镇居民在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个人服务业等方面的开支比重可能会显著上升,尤其是在居住和交通通讯上的开支比重。在这后两项商品(服务)上的开支目前占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14.2%,比1982年时的5.8%增加了8.4个百分点(15年中几乎一年增加0.5个百分点)。现在正在加速进行的城镇住房体制改革旨在取消对职工住房的隐性补贴,客观上将会使城镇居民增加在住房上的开支(尽管在短期内这也可能表现为城镇居民增加当前储蓄以便为未来的住房购买作准备)。住房与交通消费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更多的分离、工作和职业的流动性等因素都会导致人们在交通通讯上的支出不断增加。而且,随着城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地价上涨,城市居民只有通过利用更加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迁居到地价较为便宜的地区才能对付中心地区日益高涨的住房成本。

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形成了强烈的耐久消费品需求,这种强需求使中国城镇居

民在家庭用品上的开支比重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表 3）。但是，就单个商品而言，这种需求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即每个居民家庭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他们的某个耐久消费品存量）。表 4 对比了中国城镇居民和日本居民耐久消费品平均拥有量。可以看出，在 1980-1995 年期间，日本居民在许多耐久消费品上的拥有量都达到了“饱和状态”，即平均拥有量不再增长或仅有微弱增长，只用在那些诸如空调、微波炉和个人电脑等新耐久消费品上，居民平均拥有量才有显著增加。在中国城镇居民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表 4 中自行车和缝纫机的平均拥有量在 1990-1997 年期间呈现减少趋势，表明“饱和状态”已经出现。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风扇等商品的平均拥有量在这期间大幅度提高，表明它们正在接近“饱和状态”。与日本的经验一样，中国城镇居民在一些新耐久消费品上的平均拥有量现在尚处于低水平上，它们在未来时期中会倾向于显著提高。

随着城镇居民对一些耐久消费品的需求开始“饱和”或接近“饱和”，他们对耐久消费品的需求就会较多地从数量上的需求转变为质量上的需求，从对耐久消费品基本功能的需求转向对耐久消费品升级换代的需求。这些需求变化，就会给生产者带来新要求，提出新问题，并带来新机会。面对这些需求的变化，生产者必须相应调整自己的供给发展战略。首先，生产者必须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并使现有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其次，生产者必须更加重视产品质量的改进以便迎合消费者变化了的口味。第三，在国内城市市场新增空间相对缩小的同时，生产者必须考虑拓展国内农村居民市场和国外市场。如果不能有效地朝这些方向努力，生产者将会发现他们的市场空间将萎缩，他们的市场份额将会被来自国内外的竞争者所夺走。

表 5 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构成（%）

	1978	1990	1997
全部生活消费支出	100.0	100.0	100.0
食品	67.7	58.8	55.1
衣着	12.7	7.8	6.8
居住	10.3	17.3	14.4
其他	9.3	16.1	23.8
自给性消费支出	59.0	35.9	30.4
自给性食品支出	51.4	32.1	28.1

说明：统计数字基于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1998 年，第 348 页。

在过去，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但由于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低下和他们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通过非市场的、自给性交换来进行，中国农村人口并未给中国工业和经济提供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如表 5 所示，1978 年时中国农村居民全部消费支出中仅有 41% 通过市场购买，其余的 59% 则通过自给性家庭经济活动来提供。这反映了那时中国农村经济极低的货币化程度，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经济活动在极低的生产率背景下主要为自己提供食物的特征（表 5 中自给性食品支出占 1978 年农村居民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 51.4%）。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制度改进、生产率提高和商业化农业活动的发展，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的自给性消费比重显著下降了，到 1997 年降到了 30%。但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比重。1997 年，包括这部分自给性消费在内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额为 17940.5 亿元，剔除自给性消费后便只剩下 12450.7 亿元，而农村居民的自给性消费则相当于当年中国按支出法计算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 7.2%。有理由相信，如果这部分消费是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自给性活动来实现的，那么，由于支出效应乘数，国内生产总值将可能比实际数字高出许多。

展望未来 20 年，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比重（恩格尔系数）有可能降低到 45% 以下（比 1997 年水平减少 10 个百分点），他们的自给性消费支出比重有可能降低到 15% 以下（比 1997

年水平减少 15 个百分点)。再设想那时我国农村居民的自给性消费活动完全限于食品(1997 年时尚有 2 个百分点的自给性支出花在诸如居住和衣着等方面),中国农村居民实现在非食品物品和服务上的商品化或货币化。如果未来 20 年中我国农村居民平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 2%,农村人口年均增长 1%,在农村居民消费/储蓄倾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总消费支出(尤其是通过市场购买的非食品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总额)便可能达到 3.5-4.0%的年均增长率。这显然将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高速度。即使我们更为现实性地设想未来 20 年中我国农村居民平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 1.5%,农村人口年均增长 0.5%,他们通过市场购买的非食品商品和服务总消费支出也可能达到年均 2.5-3.0%的增长率。这仍然是一个可观的速度。

四、国内投资需求展望

投资需求也是国内最终需求的一部分。从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关系来看,消费需求及其增长是投资需求增长的市场动力,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的增长,投资需求必须相应地增长。在一般意义上,投资(净投资)是扩大生产能力的途径;在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前提下,通过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是厂商维持并扩大自己市场份额、增加资本回报的必要手段。

除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投资活动外,投资需求作为对资本物品的需求也有一些独立的作用。有的投资是对生产能力消耗的补偿,有的投资表现为生产存货的增加,即为了使生产和经营过程更加平稳、减少供给冲击。这些投资活动不一定增加生产能力,即在投资增加的同时产出不一定相应增加。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成本的上升,厂商投资活动中还有越来越多的部分表现为以资本物品替代劳动,即以自动化设备带替操作工人,减少直接生产工人和他们的监管者。以资本带替劳动的投资活动中通常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但在概念上一资本带替劳动的投资与生产能力扩大的投资是不同的。以资本带替劳动的投资属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上出现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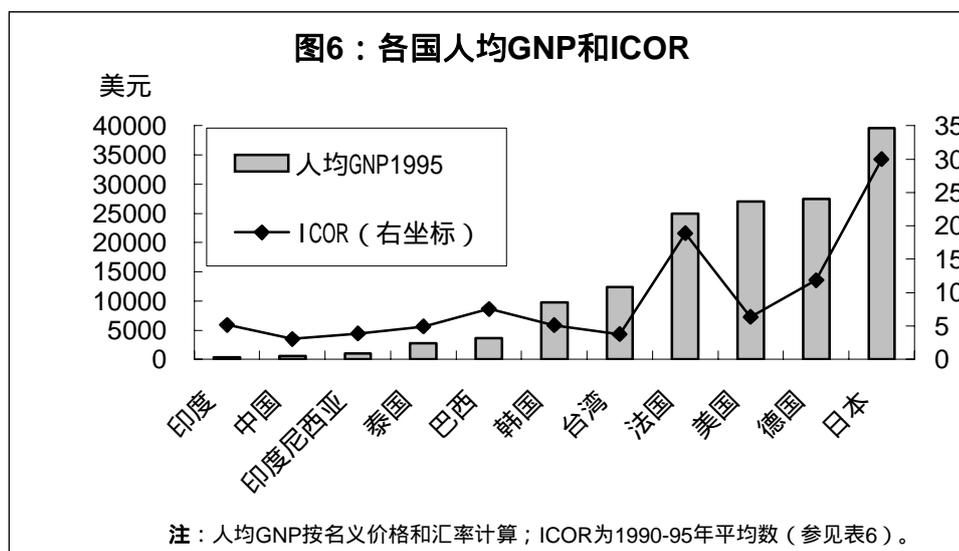
表 6 “资本-产出增量比率”:国际比较 (按 1995 年人均 GNP 排序)

	GDP 增长率 (1990/95)	投资率 (1991/95年平均数)	ICOR
印度	4.60	23.72	5.16
中国	12.80	39.26	3.07
印度尼西亚	7.60	29.56	3.89
泰国	8.40	41.32	4.92
巴西	2.70	20.46	7.58
韩国	7.20	36.74	5.10
台湾	6.40	24.18	3.78
法国	1.00	18.90	18.90
美国	2.60	16.54	6.36
德国	1.90	22.56	11.87
日本	1.00	29.98	2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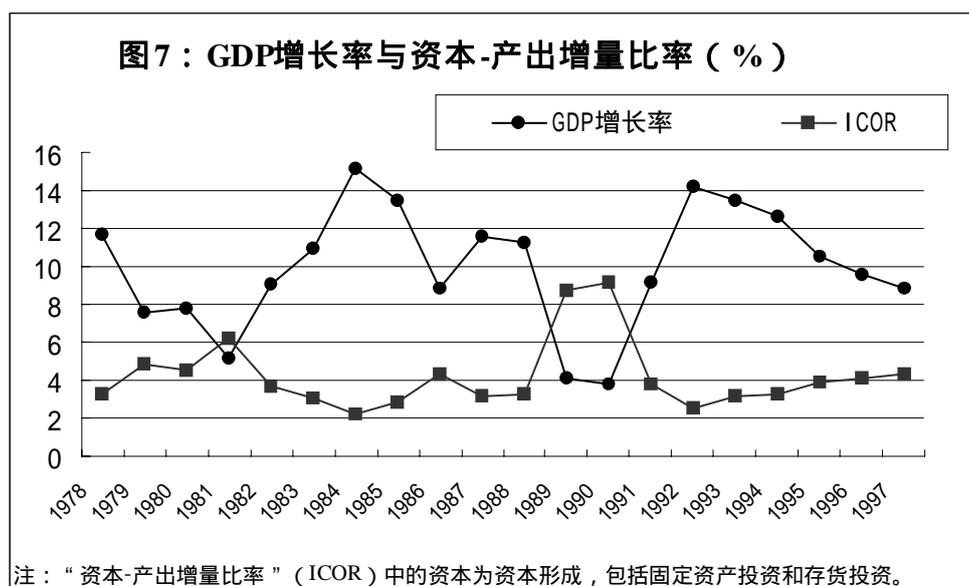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和说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1997 年;投资率为总投资形成占 GDP 比重;ICOR 为投资率除以 GDP 增长率。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中的大量投资活动可能主要属于旨在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而较少涉及以资本带替劳动的投资。人们的收入和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大量新增劳动力

来自“零边际生产力”的农村地区等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以资本带替劳动的投资相对较少可能是中国经济中“资本-产出新增比率”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较低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表6和图6）。



“资本-产出增量比率”（ICOR）反映的是1个百分点GDP的增长需要多少个百分点的GDP用于投资活动。有许多因素会影响这个比率。如上所说，投资在扩大生产能力与补偿生产能力或以资本替代劳动之间的分布是一个重要因素。投资在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分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通常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投资活动向基础设施倾斜可能会促使ICOR升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在理论上也是一个因素。此外，从我国的历史数据来看（图7），经济周期也是一个因素。一般地说，在经济增长率升高的时候，ICOR倾向于下降；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ICOR倾向于上升。



从理论上说，ICOR在经济减速时期升高的倾向所反映的应当是投资活动对低利率水平的积极反应。如果经济增长减速来自消费需求的收缩，那么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储蓄倾向的

上升；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会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生产和投资的回报率可能面临下降的压力，二是市场利率面临下降的压力；这两个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它们对投资活动的总效应取决于相互的力量对比。在企业具有调整生产资源配置并使之更加合理化的能力的情况下，市场利率下降的机会终将会被企业所利用，并进而使投资活动先于消费活动走向复苏和高涨。

过去多年中的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并不普遍地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和调整生产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从而使企业投资活动与利率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存在上述那种特性。但是，尽管如此，政府对经济周期的反应行为实际上也体现了从经济角度利用投资或推动投资的偏向。对政府而言，经济减速增长时期相对来说也是一个筹资成本（例如发行债务的利率水平）较低的时期（除非同时也出现了较高通货膨胀的势头）。不管是由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部门发动的投资活动，它们都具有在当期扩大社会总需求并有助于远期供给能力扩大的效应。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活跃企业投资应当置于优先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企业投资活动讲究资本回报和经济效益，有助于减少投资活动中浪费行为，从长远看能使建立在资本回报和经济效应基础上的投资活动无限进行下去。其次，政府投资活动主要在于那些不能直接产生或较少产生回报或收益的领域中，政府投资收益主要通过“投资 经济增长 税收按比率增长 补偿政府投资支出”这个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债务利息率，那么在税收/GDP 比率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将面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即无法收敛的危险。第三，政府融资活动（例如通过向存款银行发行国债等手段）虽然有着快速跨越“低利率、流动性陷阱”的优势，但要充分克服“低利率、流动性陷阱”仍必须依靠企业投资和消费的活跃。没有企业投资的活跃和对低利率的积极反应，政府投资增加中的一大部分可能只体现在企业对资本品的存货调整（减少）中，从政府支出增加中受益的居民也可能转而将资金送回存款银行，从而冲减政府融资活动的宏观经济效果。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政府对经济周期，除了需要直接使用政府支出和调整利率这些手段外，还需要更加关注企业投资（包括影响居民消费）的制度环境，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善制度环境，促使企业积极地对低利率经济环境作出投资反应。

概括地说，我们几个理由认为，未来几十年中，投资需求在我国将依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首先，通过改革开放和对制度环境的改善，各类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将进一步调动起来。一方面，我国企业 80 年代曾有过的在“无约束”或“软约束”条件下的投资冲动性会在新环境下减少或消失，基于经济计算和合理风险承担的投资会在新环境中相应生长起来。其次，随着我国企业体制的进步和城市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上升，以资本替代劳动的投资将会逐步增加。第三，80 年代或更早时间以来在我国建立和积累起来的资本物品存货在新技术进步的环境中需要逐步加以更新，一些资本物品存货由于建设质量原因也需要加快进行更换。第四，最重要的是，80 年代初以来，我国社会投资的部门分布是相当不平衡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投资集中在工业领域中、尤其在制造业领域中（参见表 7）。投资部门分布上的不平衡问题表明未来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将有一些前景开阔的投资领域。

表 7 工业投资占各类投资的比重 (%)

	国有部门	集体部门
--	------	------

	基建投资	更新投资	城镇集体	农村集体
1980	49.3	82.9	84.1	
1985	41.6	78.2	67.2	50.9
1990	55.9	78.0	75.1	52.2
1992	48.4	73.7	72.3	69.6
<i>制造业占各类投资的比重</i>				
1985	21.7	64.5		
1988	24.5	65.9	74.0	
1990	22.4	62.4		
1992	19.9	63.0		
1995	20.8	53.8	28.6	
1997	15.4	47.6	26.6	

资料来源和说明：1980-1995 年数据来自《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 1950-1985 年》；其它年份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制造业占各类投资的比重”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

最值得注意的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城市住房、公共教育投资、环境保护以及制造业设备更新等等。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基础设施是一个范围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公共设施”，例如电力、电信、供水供气工程、排污收废系统等；“公共工程”：公路、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其他交通部门”：城市和城市间铁路和交通等等⁷。让我们看一看道路投资、城市地铁投资、发电能力投资、城市住房投资、公共教育投资和环境保护投资等几个方面的情况。

道路投资

道路建设是我国基础设施中一个滞后部门。世界银行 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增指出“中国城市间的交通网络是世界上最稀疏的交通网络之一”，中国“每年因交通基础设施不足而增加的成本大约相当于 GNP 的 1%”⁸。交通网络的不发达，影响到我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许多地区追求自成一体的地方工业体系，妨碍了全国经济效率的提高。

表 8 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各种道路长度总计尚不及国土面积比我国小、人均收入水平比我国低的印度。面积仅为我国 25 分之一的日本也拥有比我国长的道路。在道路密度指标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十分巨大。此外，到 1997 年，我国各种道路中仍有大量“等外路”（它们占公路总长的 18.7%），高速公路仅有 4770 公里，高速公路加上一级和二级公路仅占公路总长的 10.7%。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公路建设。从 1990 到 1997 年，我国公路长度每年增加 2.5%，是 1978-1990 年增加速度 1.2% 的两倍。而且，在 90 年代中，我国公路建设的重点放在了高等级公路上。在今后 20 年中，我国公路建设继续按每年 2.5% 增加，我国公路总长度到时也不过只增加 64%，届时我国道路密度也只能达到 1993 年巴西所达到的水平。很有可能，在举国上下日益重视道路建设的世纪之交，我国公路投资的规模会进一步加大。在从 1990 年代中期到 2020 年的 20 多年中，我国新增公路长度的速度有可能达到每年 3% 左右。按照这个速度，到 2020 年，我国公路长度可以达到或接近美国 1992 年水平的一半，即我国现有公路长度增加 1.5 倍。

表 8 道路长度和密度：中国及其国际比较

各种道路长度总计	道路密度(公里/平方公	统计年份
----------	-------------	------

	(万公里)	里土地面积)	
中国	108.35	0.13	1993
印度	296.25	0.61	1989
韩国	6.13	0.62	1993
日本	113.10	2.99	1993
巴西	182.44	0.21	1993
美国	627.79	0.64	1992
德国	63.63	1.80	1991
法国	81.16	1.47	1993

数据来源和说明：《国际统计年鉴》1998年，第279-282页；因缺我国“土地面积”统计数，原表未给出我国道路密度；本表按我国国土面积的90%为土地面积推算出我国道路密度⁹。

在这个估计下，我国未来的公路投资总规模可以推算出来。根据1995-97年的数据，新增每公里公路所需投资约为120万至410万元。前一个数字得自1995-97年全部基建和更新公路投资的75%除以同期内全国新增公路里程，后一个数字得自1995-97年“新建、扩建基建公路投资”除以同期内基建投资新建公路（参见表9）。高低两个数字的平均数为265万。如果说到2020年我国新增公路总长为150万公里，那么这将需要总共39,750亿元公路投资额（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下同）。按20年平均，这意味着每年公路建设投资近2,000亿元，是现有公路建设投资水平的一倍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用于已有公路的维护和更新投资。

表9 我国公路投资和长度增长 (1995-97年)

	1995	1996	1997
基建公路投资(亿元)	371.98	499.07	668.20
其中“新建、扩建”投资	297.00	431.47	579.47
更新公路投资(亿元)	37.17	61.84	76.41
新增公路里程(万公里)	3.78	2.88	4.06
新增高等级公路里程(万公里)			1.88
基建投资新建公路(公里)	9450	10179	12203
基建投资改建公路(公里)	14176	17090	20600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8年；“新增高等级公路”指高速公路加一级、二级公路；在我国公路建设投资统计中，还有一些项目未列出到本表中“基建”或“更新”投资中，例如用公路养路费进行的改建公路投资被列入“其他投资”中。

城市地铁投资

我国城市内部交通设施的不发达和交通系统的拥挤，已为国内外观察家广泛注意到。目前除了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少数特大城市建设有稀疏的几条地铁线路外，地铁交通网未在我国城市中普及开来。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解决城市人员交通的重要工具是地铁网，人口在50万以上城市中地铁网建设便开始具有经济价值，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城市可能需要至少200公里的地铁网。在今后20年中，地铁网建设很可能在我国各个城市中大规模开展起来。

对地铁网的需要直接取决于城市个数和城市人口数。这两个指标在我国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从1982到1996年，按“非农业人口”计算、不包括市辖县人口的我国城市人口数从9,712万增加到20,779万，年均增长率为5.6%；同期内全部城市数目从239个增加到666个，其中50万人口以上城市数目从48个增加到74个，大约每年新增2个这样规模的城市（表10）。

表10 全国城市数目 (按城市人口规模分组)

城市人口数	全部城市	200万以上	100-200万	50-100万	50万以下城
-------	------	--------	----------	---------	--------

	(万)	数目	城市数	城市数	城市数	市数
1982	9712	239	7	13	28	191
1985	11826	324	8	14	30	272
1990	15028	461	9	22	28	402
1996	20779	666	11	23	44	588
2020	67014	1400	15	30	70	

(预测)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107页;1986年第94页;1991年第653页;1997年第331-2页;按“非农业人口”统计各个城市人口规模;不包括市辖县人口。“预测”系本文作者估计,参见正文说明。

按照5%城市人口增长率,未来20多年中我国城市人口将增多2倍左右,我国全部城市数目可能增多2倍(即达到1,400个左右),50万人口以上城市数目可能新增加至少40个,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目可能达到15个。按照200万人口以上城市各需要200公里地铁线、100-200万人口城市各需要100公里地铁线、50-100万人口城市各需要50公里地铁线计算,到2020年我国各个城市所需地铁线总长为9,500公里。

每公里地铁线所需投资在北京地区现为5-8亿元,全国平均可能在2-6亿元,平均数为3亿元左右。9,500公里地铁线所需投资总额按静态算法为28,500亿元。分摊到20年中,平均每年为1,425亿元。这个数字,可能相当于现有几个大城市年度地铁投资总和的10倍。

发电能力

从1980到1995年,我国人均电力消费量大幅度提高,年平均增加6.3%。但是,到1995年,我国人均电力消费水平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是较低的:我国水平仅为日本水平的10分之一,为美国水平的18分之一。而且,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在提高人均电力消费水平上发展比我国快:1980年韩国水平为我国水平的3.3倍,到1995年却为我国水平的5.6倍(参见表11)。

电力基本上是一个非贸易商品,所以电力消费主要依靠国内供应,即国内发电能力及其增长。发电机装机容量是发电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¹⁰。

表 11 人均电力消费量和发电机装机容量：中国及其国际比较

	人均电力消费量(千瓦时)		发电机装机容量 (万千瓦,1995年)
	1980	1995	
中国	253	637	
韩国	841	3606	3535.5
巴西	977	1610	5903.6
俄罗斯	4706	4172	21085.7
日本	4395	6937	22699.6
美国	8914	11571	76487.6
德国	5005	5527	11542.8
法国	3881	5892	10761.1

资料来源和说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99年“世界发展指标”;装机容量见《国际统计年鉴》1998年第262-65页;原表中无中国装机容量数字。

这里我们缺乏我国现有电力装机容量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年新增装机容量统计数字中推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列出自1952年我国基建新增发电机组容量的统计数字(它们包括各种火电、水电和核电等等,下同)。从1952到1990年,按照这个口径的全部新增发电机组容量为12513.4万千瓦;如果只从1963年算起,则为11400.9万

千瓦；从 1991 到 1997 年，我国通过基建和更新投资每年新增发电机组容量总计为 11893.3 万千瓦（其中通过基建新增 10767.4 万千瓦，通过更新投资新增 1126.24 万千瓦，参见表 12）。概括地说，我国现有全部发电装机容量可能在 23294.2 万千瓦到 24406.7 万千瓦之间。这个水平，相当于美国 1995 年水平的三分之一。

如果在未来 20 余年的时间中，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保持 5.5-6.0% 年均增长速度，到 2020 年时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可能赶上美国 1995 年水平。即使做到这个程度，到时我国人均电力消费水平仍将大大低于美国（美国为我国水平的 6 倍左右，假定美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不变、中美两国人口比率不变）。保守地说，到 2020 年时，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美国 1995 年水平或这个水平的 2/3 是有可能的。这意味着，相比 1997 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将增加 27100 万千瓦到 52600 万千瓦之间，按 20 年和中间数计算，平均每年增加 2000 万千瓦。

根据表 12 的数据，近年来我国每新增 1 万千瓦发电装机容量，大约需要 5000 千万到 1 亿元投资额。按静态估计，今后每年新增 2000 万千瓦发电装机容量，约需要 1500 亿投资额。这与近年来我国在发电能力上的投资额及其增长趋势基本吻合。

表 12 中国发电能力投资和新增装机容量 (亿元和万千瓦)

	基建投资		更新投资	
	投资额	新增装机容量	投资额	新增装机容量
1990		915.6		109.47
1991		1137.3		82.39
1992		1378.9		86.76
1993	675.13	1344.7	73.50	100.72
1994		1409.8		100.4
1995	1124.15	1442.0	181.82	221.0
1996	1374.19	1741.3	218.70	231.2
1997	1757.34	1397.8	234.78	194.3

资料来源和说明：《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投资额系“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但电力属于其中主项；新增装机容量中包括各种火电、水电和核电等等。

城市住房投资

1996 和 1997 两年中，我国城市居民住房投资总额每年约为 1700 亿元。因为 1997 年是当前经济周期中的一年，所以城市居民住房投资相比 1996 年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但是，这个短期性现象不能成为我们进行长期分析的出发点。

影响城市住房投资及其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增长率和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扩大的趋势。按照本文表 10 的统计口径，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率在 1982-1996 年期间平均为 5.6%。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我国“市镇人口”统计口径，1978-1997 年我国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4.1%。这两个数字都可以用作我们判断未来 20 年中我国城市住房投资增长率的参考。我们可以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仍然将保持这样的速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上述两个数字所表明的是未来几十年中我国城市住房投资增长率的低限。

在城市居民平均住房面积方面，从 1978 到 1997 年，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 3.6 平方米增加到 8.8 平方米，每年递增 4.8%。考虑到人均 8.8 平方米仍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可以设想在未来 20 年中我国城市居民对居住面积的改善将继续保持强烈的愿望，人均居住面积每年按 3.5-4.0% 速度递增是可能的。按照这样的增长率，20 年后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也只达到 17.5 平方米至 19.3 平方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大城市现有的平均水平。

城市人口增长率为 4.0-5.5%，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增长率为 3.5-4.0%，两者乘积的低限和高限分别为 7.6%和 9.7%。在城市住房建设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为满足这种城市住房总面积的增长，城市住房投资也需要相应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对住房建筑和安装质量要求的提高，那么，未来 20 年中我国城市住房投资平均增长率在 8.0-10%之间是很有可能。

公共教育投资

教育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滞后部门。在资金投入上，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属于世界上较低水平的国家之一。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表的统计，1980 和 1985 年时我国的这一比重在 2.5%，到 1995 年下降到 2.3%¹¹。世界银行“中国教育考察团”针对我国 1993-94 年时的情况指出，“中国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与欠发达国家的 2.8%、发展中国家的 4.1%和发达国家的 5.3%相比是低的”¹²。

低的公共教育投资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反映教育部门的问题。在我国各类教育机构中，国有教育机构占统治地位。1997 年，全部教育机构职工人数为 1,295 万，其中 1,258 万就职于国有教育机构，后者占前者的 97.2%。在这样一种格局中，教育机构除了依赖公共资金投入外，很少有其他资金投入来源。90 年代初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高等院校全部经费支出中，政府拨款占 80%以上，学生缴纳学费占 4-5%，学校创收占不到 15%¹³。来自非公共资金（即各种各样的集资、赞助和收费）的收入大部分作为职工人员的工资补助、津贴和其他补偿，很少投入到教育机构的资本形成中。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拨款基本上按照学校全部经费 20%的比例支付基建经费，但基建经费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经常被挪用作经常性经费¹⁴。

我国教育发展滞后性问题从 90 年代中期起受到广泛注意。1995 年 9 月开始实行的《教育法》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第 54 条款），“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第 55 条款）。1999 年 1 月开始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指出了前述条款对高等教育机构的适用性。

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中，教育事业在我国将受到更加高度的重视，政府对教育机构的财政投入将会逐步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可能提高到介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与发达国家一般水平之间。这两个水平在 90 年代中期分别为 4.5%和 5.5%。也就是说，未来 20 年中教育公共投资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可能从目前的不足 2.5%上升到接近 5.0%，即该项比例指标翻一番。

环境保护投资

与教育事业一样，环境保护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呈现快速恶化趋势。空气质量下降。水资源在一些地区出现短缺。大量内陆河流和湖泊受到污染。生态环境退化和人为污染已经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各种污染带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各种损害效应已经达到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3.5-7.7%的程度¹⁵。

我国目前的统计体系中还没有专门项目汇总来自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投资¹⁶。按照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初步估计，环境保护投资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90 年代中期大约为 0.5%。他们认为，按照“中等投资方案”，这一比重到 2020 年前将达到 1.0%；而按照“高水平投资方案”，这一比重可能达到 2.0%¹⁷。在另一个地方，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

指出，我国治理空气和水污染所需费用在今后多年中将达到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1%¹⁸。

事实上，环境保护投资并不完全由政府机构进行。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消费者对环境保护日益增长的需求，企业也将增加对与其产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投资。企业在环境保护上投资还将越来越多地与它们在科技开发上的投资联系起来。环境保护投资在未来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事业。

五、 结束语和政策建议

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和阶段性跃进。在国内市场上的各种矛盾正在显现出来。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正确应对这些市场矛盾。目前所看见的消费市场和企业投资活动的减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已达到的水平仍然有着较大差距，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需求的空间依然将是巨大的。尽管需求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制约作用不是总量性的，但在短期中这种制约可能变成总量性的。来自需求的制约作用在长期中主要是结构性的。总的说来，需求 – 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 –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明显地增大了，而且还会越来越大。

在应对市场需求制约作用的问题上，基本的思路应当是以市场为中心、政府围绕着如何最大程度地帮助调动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没有消费市场的活跃和企业投资需求的兴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刺激措施将难以为继。

在消费方面，应当在继续维护消费者合法合理权益的基础上帮助消费者树立和增强消费意愿和信心，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便利条件和各种信息信贷中介服务，促使消费者逐步建立新的消费观念并促使企业自觉地认知和适应消费市场结构变化的趋势。

在投资方面，应当继续强化资金约束，维护投资者和生产者的合法合理权益，帮助企业树立和增强投资意愿和信心，为企业创造一个较为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平、合理、透明的竞争性经营环境，促使企业清楚地认知长期经济增长的乐观前景并作出积极反应和结构调整。

引用文献注释：

¹ 孙毓新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人口》(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431-433页。

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0-201.

³ 由于储蓄是社会总产出的一个比例，而社会总产出随储蓄增加而减少，所以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储蓄的数量在储蓄倾向提高后未得到增加。这个结果被称之为“储蓄难题”(paradox of saving)。参见 Olivier

Blanchard: *Macroeconomics* (Prentice Hall, 1997), p.54.

⁴ 参见, Klaus Schmidt-Hebbel, Luis Serven, and Andres Solimano: "Saving and Investment: Paradigms, Puzzles, Policie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11, No.1, Feb 1996), pp.87-117.

⁵ 世界银行组织撰写的《东亚奇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年)指出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东亚许多发展中经济通过外向型发展方式实现了高速增长和收入分布平均的双重奇迹。但是, 较近的观测却说明, 到90年代中期, 在我国和泰国等东亚经济中, 收入分布有不平均加重的趋势, 甚至成了“过去30年中国际上有记载以来的两个最显著的收入分布不平均加重的事例”(参见 Michael Walton: “东亚奇迹的顶峰”, 《金融与发展》1997年9月号, 第7-10页)。

⁶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年), 第9-10页。

⁷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年: 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 第2页。

⁸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年: 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 第18页。

⁹ 《中国统计年鉴》在“自然状况”、“自然资源”和“土地状况”等项下有我国国土面积的统计数字, 但无直接的土地面积统计数字。联合国 UNDP《人类发展报告》1998年列出我国土地面积数字为 929,100 千公顷(合 9,291,000 平方公里, 见表 24, 第 180 页)。《中国统计年鉴》1998 年列出我国内陆水域面积为 1,747 万公顷(合 174,700 平方公里, 见第 6 页)。按 UNDP 数字, 土地面积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96.8%; 按《中国统计年鉴》数字, 内陆水域面积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1.8%。本文按国土面积的 90%推算我国土地面积, 可能低估了实际土地面积, 因而夸大了目前我国的道路密度。

¹⁰ 按世界银行统计数字, 我国配送电损失率(即配送电过程中损失的电力占电力总产出的比重)在 1995 年为 7%, 接近于高收入国家平均 6%的水平(参见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99 年“世界发展指标”表 18; 另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 年“电力工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 59 页); 但是, 世界银行发表的电力工业“系统损耗占总产出的比重”, 1990 年我国的水平(15%)远高于发达国家普遍在 10%以下的水平(参见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 年“世界发展指标”表 32)。

¹¹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88*, p.16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p.200.

¹² 世界银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第 47 页。

¹³ 世界银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第 52 页。

¹⁴ 世界银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第 55 页。

¹⁵ 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第 78 页。

¹⁶ 《经济日报》1999 年 4 月 13 日报道, 九五规划提出在 1996-2000 年期间全国用于治理污染的投资不少于 4500 亿元; 1998 年 334 个环保项目总投资额为 1076 亿元, 其中属于当年为扩大内需而追加的投资为 224 亿元。

¹⁷ 世界银行《碧水蓝天: 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第 99 页。

¹⁸ 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第 79 页。